

Prosthesis, Illusions, and Pharmacology: Stigler's Thoughts in *Dune 2*

Yu Shanhong

Abstract: After the adapted science fiction film *Dune* directed by Dennis Villeneuve swept cinemas worldwide in 2021, *Dune 2* three years later once again presents the grand and complex future ecology on the screen. The dune world, which once existed only in imagination, has been concretized through the audiovisual industry to meet the audience and achieve mutual connection through isomorphism with consciousness. This is what French philosopher Stigler called 'Archi-cinéma', also known as the 'Tertiary Retention' of technology. Although technology and mechanized storytelling are only part of the film's portrayal of the sand dune ecology, thanks to Stigler's perspective, interpreting *Dune 2* from the angles of tech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archi-cinéma, and technological pharmacology, we can still see more dialectical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 in this film.

Key words: *Dune 2*; Stigler; Technology prosthesis; Archi-cinéma; Techno-Pharmacology

义肢、幻境与药理：《沙丘2》的 斯蒂格勒之思

余善泓

摘要：自2021年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改编科幻电影《沙丘》席卷全球电影院之后，3年后

的《沙丘2》再次将恢宏而庞杂的未来生态呈现于银幕前。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沙丘世界通过视听工业具象化后完成了与观众的相遇，在与意识的同构中实现“彼此联通”（Circular）。这便是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口中的“元电影”（Archi-cinéma），亦是作为技术的“第三持留”。虽然科技与机器化叙事只是影片展现沙丘生态的一环，但承蒙斯蒂格勒之眼的观照，从技术代具、元电影、技术药理的角度解读《沙丘2》，我们还能看到这部电影更多关于技术的辩证之思。

关键词：《沙丘2》；斯蒂格勒；技术代具；元电影；技术药理学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沙丘2》剧情上承接第一部末尾，讲述了少年保罗被皇帝和哈克南人灭族后，在沙丘星球加入当地弗雷曼人并联手成为其领袖，率领弗里曼人反抗帝国统治的故事。在《沙丘》系列之前，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就以《降临》《银翼杀手2049》等影片中鲜明的美学风格和连贯的主题表达，在类型化的科幻题材市场站稳脚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在为《沙丘》做准备”，将美国科幻小说家弗兰克·赫伯特的同名小说《沙丘》系列搬上大银幕，是维伦纽瓦作者意识的一脉相承。有别于贴近科学本源、注重科学实证性与技术可行性的“硬”式科幻作品，身处新浪潮科幻运动中的赫伯特将主流文学的手法引入科幻作品中，力图追求科幻作品中的文学性及人文关怀。而科幻母题下的时代之思正是维伦纽瓦的导演风格之一——除了科幻，影版《沙丘》同样是一个历史故事：未来宇宙依旧涉及封建政治、超验宗教、父权种系、殖民主义、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

作为科幻电影最基本的科技书写，《沙丘2》隐秘地遵循了一条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思路。这位自德里达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理论思想在与柏拉图、德里达、海德格尔、勒鲁瓦-古兰、弗洛伊德、西蒙栋等哲学家展开对话的同时，还对接至有关技术、时间、记忆、药学、个性化、后种系生成、资本主义社会等问题的思考中，形成了原创性的技术哲学思想。援引古希腊的三则神话，斯蒂格勒建构其技术哲学的三项基本假设——爱比米修斯原则、普罗米修斯原则，以及潘多拉原则，正是电影《沙丘2》从技术与人身体的结合、技术对人之意识的作用、技术的双面性等多个方面所展示的人与技术之间相互替补、若即若离的暧昧与纠缠。

一、爱比米修斯原则：《沙丘》中的人技叙事

斯蒂格勒对于技术问题的思考接续了他的老师德里达对于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以逻各斯主义为中心的二元论批判。古希腊三贤时期，真理（逻各斯）被视为最高存在者，是绝对的在场和第一所指；技术是一般存在者，是最高存在者的能指和派生，真理和技术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西方工业革命后，科学与技术二者结合发展出了一种新形态，即科学技术（Technology），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所谓必然域（科学）和偶然域（技术）无法联合的论断，宣告了其在技术问题上的失败。然而，即便形而上学的时代在19世纪已然终结，目前流行的理解技术的几种主要立场中，无论是将技术当作工具的人类中心主义，抑或将技术推上神坛的技术中心主义，依旧沿用了将人与技术分开的二元论方法，其实质仍然是形而上学思维的表征形式，既无法看清人与技术关系的本质，也无法给出人类究竟要以何种方式与技术相处的最终答案。

而“沙丘宇宙”的故事正是起于一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大战——“巴特勒圣战”。彼时的人类正逼近人类中心主义的巅峰——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无所不能、无远弗届，使掌握技术主导权的人类变得不可一世，傲慢地认为包括技术在内的宇宙万物皆受人类的奴役和改造。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①，技术既非有机物体也非无机物体，无动力无目的：“技术物体不过是人类的发明物，其目的在于人，因此只是偶然地存在着，并不是自然中本身就存在的。”^②于是，人类生活愈加懒惰，并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被称为“全能者”的人工智能，但未曾预料自己正一步一步踏入深渊。技术虽非有机物体和无机物体，但是技术却可看作是一种有机化的无机物体，它作为物质趋势存在于存在者中，有着自身进化的动力和进化系谱。所以，基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斯蒂格勒说，“我们必须像研究生物机体的进化一样来研究技术及其进化”。技术自有其生成的趋势，但除了先进必然代替落后，技术进化趋势并不会表现出显而易见的整体性和必然性。人类与技术一定是相互生成与互补的，当人类过度放权技术，技术才会露出野心的獠牙。人工智能终于从人类的工具变成奴役人类的主人。人类历史随即滑向了另一个极端——技术中心主义。如同赫拉利的“数据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③

在这近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中，技术几乎反噬了人类，算法成为生物与机器行动的共同准则，人类逐渐失去决策能力，变得越来越像自己创造的那些机器。这种状态便是斯蒂格勒口中的“无产阶级化”的真实写照：不光是技能知识的离散化，生活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同样在技术文码化的过程中离散化了。但人类终究是无法被替代的，巴特勒圣战中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赢

①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 [M]. 苗力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7.

② 陈明宽. 技术替补与广义器官: 斯蒂格勒哲学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37.

③ [以] 赫拉利.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 [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43.

得了胜利。

正是这一场“沙丘宇宙”最重要的战争，终结了“技术中心主义”的时代，但同时也把人类从一个黑暗推入另一个黑暗。圣战之后，人类世界确立了一条绝对原则，即任何人不得制造任何思维机器，以确保人类的主导地位不受威胁。但彼时的星际旅行因为圣战变得太慢太危险，以至于一度彻底无法进行了。“人类就像早产的小动物，赤裸裸的，没有皮毛，也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他们来得太早，也来得太迟。”失去了人工智能加持的人类，在未来的宇宙纪元中举步维艰，人类需要新的技术武装自身，因为人类从诞生之初便一无所有，必须借助于外在之物而存在，技术成就了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这就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中的“爱比米修斯原则”——爱比米修斯因粗心大意忘记为人类分配技能，为了弥补他的过失，哥哥普罗米修斯只得从天神那里盗取智慧之火和技艺之秘，正是普罗米修斯的这份厚礼使得人类从此有了安身立命的武器。^①爱比米修斯原则深刻揭示了人类自诞生之初便伴随着固有的不完美性，这一根本性的缺陷源自爱比米修斯在分配天赋时的不慎遗漏，凸显了人类存在的原始不足。虽然如此，这种所谓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却为人类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斯蒂格勒来说，这种缺陷一方面允许我们去发明自身，另一方面却迫使我们永远地寻找外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去完成和构成我们。”^②从爱比米修斯原则上看，人类在茫茫宇宙中发现“香料”，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人类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替补”来弥补自身起源处的缺陷。

上述的分析已隐晦地透露了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对于人类躯体的定位与意义是什么的结论：技术是人类的躯体外器官（Exosomatic Organs）。这一结论由来的根源，从神话学上讲，在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所造成的人类先天缺乏本能的缺陷性起源；而从实证性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意义上讲，则在于勒鲁瓦-古兰的“外在化”理论：人类的进化是使躯体的“器官功能”逐渐外化而进化的。斯蒂格勒在“外在化”理论的基础上对接了德里达的“延异”思想，提出了他最为人所熟知的概念之一——“技术代具”。他强调，技术不应被简单归类为自然物体或生命物体，而应被视为一种有机化进程中的无机要素。技术在人成为人之时就构成了人的一部分。相较于人体的内在器官，技术实质上充当了人类的“替补”，构成了人的外在器官，即技术代具。例如，石制工具、弓箭、人工智能就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的技术代具，分别将人类的骨骼记忆、肌肉记忆，以及思考记忆逐渐外在化。当人们对这样的技术习以为常时，技术便以内化入身体，与内在器官融为一体。所以我们看到，当屏蔽场技术让未来战争倒退回到冷兵器时代——且不论屏蔽场本身就是人类免疫系统的外在化，器官与技术的融合反而得到了更加淋漓

^① 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I: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M]. Translated by S. Barke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9.

^② Howell C., Moore G. *Stiegler and Technics* [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9.

尽可能地展现：弗里曼人的蒸馏服、雷托公爵释放毒气的假牙、铭刻下记录之声的伊勒琅公主的日记……技术与技术物体成了人类的躯体外器官，与人类的躯体器官共同构筑了人类的生命，这种生命是广义上的生命，是作为心理个体的个人与技术个体互个性化的生命。利用香料刺激来短暂获得超级智能的做法，造就了宇宙时代的人类文明向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帝制倒退，人类也被自己制造的“超能力”划分为了三六九等。因此，集体个体同样参与到互个性化的转到关系中，这也构成了斯蒂格勒所说的广义器官（Organology）。人类似乎拥有了超级智能，但其实是彻底承认人类没办法通过自身的内在努力获得智能的普遍进化，从而使得文明发展只能永恒限制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不过，人作为外有机体，仍然可以运用理智来接纳沙漠力量。就像邓肯描述的弗瑞曼人一样，成为沙漠的一部分，也让沙漠成为你的一部分。要知道，在小说的故事发生前，弗瑞曼人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已经花了数千年来调整习性，也就是生活方式。

二、普罗米修斯原则：第三持留下的如臻化境

如果说，爱比米修斯神话的技术哲学意义在于爱比米修斯的疏忽构成了人类固有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相对于动物而言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技术哲学意义则在于普罗米修斯的过失也为人类带来了一种不完美性，即其行动虽出于善意，却无意间招致人类一种相对于永恒神祇而言的缺陷。普罗米修斯与雅典娜一同创造了人类，作为人类的维护者，他一贯偏袒人类，想方设法帮助人类摆脱向诸神献祭的负担。他宰杀了一头牛，并将它切成碎块分为两堆。一堆将细嫩的牛肉隐藏在厚重的牛肚下，而另一堆则将骨头与内脏藏在厚厚的油脂下，这一堆比另一堆大一些。普罗米修斯原以为凭借这种方法可以瞒天过海，但宙斯拆穿了他的伎俩，愤怒地向人类进行报复。由于人类是唯一吃“熟食”的物种，于是宙斯便把火藏了起来，这样人类将在无法吃到可口熟食的恐惧中感受饥饿。正是普罗米修斯的欺骗令人类意识到自己与神的区别——众神无需食物便可永远不朽和年轻，而人类则需要不断地享食，那反复萦绕的饥饿感象征着自己的肉体不过是“向死而生”。

于是普罗米修斯又一次欺骗了宙斯，他利用茴香秆将天火的一颗火种带回了人间。“普罗米修斯之火是一团智慧之火，一团技巧之火……它同时又是不稳定的、会灭亡的、饥饿的。”^①人类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人工之火，才能够享用熟食，进而摆脱饥饿避免死亡。斯蒂格勒说：“人类必须利用技术之火才能延迟（Defer）死亡。”死亡，便是普罗米修斯原则，正是死亡的超前性，让人类意识到技术作为替补的同时也是要不断进化的，而进化的目的正是要弥补死亡这一人类必有的缺陷。技术是死亡的替补，死亡是技术进化和人类进化的动力。

^① [法] 韦尔南. 神话与政治之间 [M]. 余中先,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310.

我们看到，在《沙丘》故事中遥远的未来，由于智能设备被禁止，人类发展重心放在了精神能力的探索上——贝尼姐妹会的音言能力、人型计算机门泰特的算力能力以及宇航工会宇航员的太空巡航能力等，这些都是进化和改造的结果。而这一切超自然能力的根本，便是盛产于厄拉科斯星球上比黄金还珍贵的土特产——香料。在《沙丘》中的“香料”为何物？从作品来看，当然是以“美琅脂”为核心的一系列周边，除了吞噬沙海的巨型蠕虫“沙虫”，还有如蚯蚓大小的“沙鳟”、体内凝结而生的古早香料，和充满预言能力的毒物致幻剂生命之水。从功能上看，香料和石油类似，是故事中最前沿、最核心的技术。可以说，如果没有香料，整个“沙丘宇宙”的运行都会在瞬间分崩离析。由此可见，技术并不因数字技术消亡而缺位，反而像“幽灵”一般复活，以新的外壳（香料）回到了人类斗争的中心，以新的形式（精神能力）延续人类缺陷的替补。

而这种精神能力最典型的代表便是主人公保罗·厄崔迪预知未来的能力。围绕着保罗预言能力的觉醒与成熟，《沙丘2》从《沙丘1》有关哈姆雷特式的“我是谁”的探讨过渡到一个麦克白式的命运悲剧，讲述的是“命定未来与个人价值冲突”的电影内核。但在进一步讨论这个古老的俄狄浦斯王命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这些注定会发生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呈现给保罗以及观众的？没错，是通过保罗的梦境。正如《沙丘1》一开头伊勒琅公主日记所言：“梦境是来自深处的信息。”保罗最初的梦境是碎片式的：一片广袤的沙漠或是一位神秘的弗里曼女孩。在缺乏明确时空逻辑和具体意义的前提下，这些信息显得混沌无序。但是，随着保罗与香料的接触越发频繁，保罗所梦见的碎片逐渐拼凑完整，我们也能终于确认主人公保罗身上“我即未来”的宿命感。伴随着保罗的预言能力不断加强，他感知未来的方式开始不再局限于梦中，香料为保罗打造了一副新的广义器官，将来自未来的所见、所言、所听、所感构筑成保罗脑海中的幻境，直到在《沙丘2》中保罗喝下生命之水，获得与族群共享记忆的通感能力，在战争会议上指认他人的过去，成功让在场的弗里曼人臣服，成了真正的“李桑-阿尔盖布”。

为何是梦境？或许这又要回到斯蒂格勒。斯蒂格勒在分析电影工业时，发现电影结构与意识机制间深度同构与关联。斯蒂格勒洞见意识活动所具有的“电影特质”，从而发掘“意识犹如电影”命题，即构建了“元电影”（Archi-cinéma）；通过日益凸显的技术客体，确立被胡塞尔否定的“第三持留”（塑像、油画）合法性，将电影作为第三持留家族成员的典型加以构建；依照德里达反客为主的替补原则，颠倒“第三持留”与“第一持留”（Ré-tention Primaire）内外关系，以凸显第三持留的重要性。^①斯蒂格勒揭示了以电影为代表的视听工业的特殊性：作

^① 陈开晟. 元电影、后电影与后人类药理学——贝尔纳·斯蒂格勒电影理论的跨越性批判与发掘[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0(8): 4-15.

为新晋的第三持留，它不仅是对感知的对象的再造，更是与感知本身高度重合。在电影强大的表现力之下，第一持留（感知）与第二持留（想象）不再对立，观众也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构。我们回头再看，从《沙丘2》中保罗在香料的加持下梦境逐渐清晰与完整，便是印证了从油画到摄影再到电影的第三持留向第一持留进化和演进的过程。保罗的梦境，并非是弗洛伊德所言的潜意识的象征，而是一种感知与记忆的传承，更为接近荣格“集体潜意识”的概念：这是人类先天就具有的一种共同的“内容和行为模式。”因此，保罗的梦境本就是一部电影，如同费里尼的《访谈录》中拍摄电影女演员观看自己曾经的戏码一样，第一持留、第二持留与第三持留被巧妙地融合在了同一个事件之中。在保罗感受梦境的同时，观众也在感受着保罗，享受着曾经原著小说无法带来的视听盛宴。正如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感慨道：“记忆被推到历史的中心，这是文学辉煌的葬礼。”^①

既然香料所推动的精神能力的进步不过是意识的具象与记忆的共享，那我们不禁要反问，这种梦境是否真的真实？梦境与未来是否真的具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保罗并非就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在《沙丘1》结尾保罗与弗里曼战士詹米的决斗之前，保罗既看到了自己存活，也看到了自己的死亡。在《沙丘2》中，保罗也看到了契妮被烈日烤焦的景象。这正是维伦纽瓦想要在电影中传达的：保罗在幻象里预言的未来是一个开放的、具有无数可能的未来，那么如何在无数可能里面，选择最正确的那条路？与其说救世主的出现是一种预言的应验，不如说它更像是人们心理上的主动选择。对于姐妹会而言，“奎萨兹·哈德拉克”的诞生是她们漫长育种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不过保罗本身却在预料之外；对于弗里曼人而言，“李桑-阿尔盖布”是他们摆脱外来统治的希望之光，即便他同样是姐妹会剧本的产物；对于保罗自己而言，他确实能够洞晓过去，也能预见未来，但为了遵循既定的命运成为所谓的“救世主”，他选择了欺骗深爱着他的契妮，以获得神谕中的“沙漠之泉”。从这个角度来讲，《沙丘2》讲述的并非是救世主的故事，而是“屠龙勇士终成恶龙”的故事。

三、潘多拉原则：希望与记忆的毒性

《沙丘2》的叙事核心从上一部政治权力斗争中转向了人性的选择，一直在反抗宿命的男主角保罗，最终选择成为民族预言中的“救世主”，通过宗教统治，他实现了复仇、登基和万众皈依的信仰，却独独失去了自我。这便是在获得了后种系发生记忆（Epiphylogenetic Memory）的“预知未来、洞悉历史”集于一人的疗性的同时，保罗也必须忍受其所带来的潜在毒性。正所谓“是药三分毒”，技术这种如同药一般的双面性便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第三项

^① [法] 韦尔南. 神话与政治之间 [M]. 余中先,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310.

基本原则——潘多拉原则，它也是斯蒂格勒对技术的基本看法。

对药理学问题的考察，最早来自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中提到《斐德罗篇》里的泉水女妖法玛西娅的故事——法玛西娅提供的水能解渴，却同样带来死亡。为了揭示药性的多义性，德里达提取了法马西娅 (Pharmacia)、药 (Pharmakon)、巫师 (Pharmakeus)、替罪羊 (Pharmakos) 等和药相关的词语，这些词汇不仅字面上相互联系，而且“修辞关系构建逻辑关系，逻辑关系则人为叙述，是隐喻的隐喻”。^①在这一基础上，斯蒂格勒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药理学理论脉络：缺陷—延异—分叉—替补 (Defect—Différance—Bifurcation—Supplement)。斯蒂格勒认为，技术作为一味药，既是对人类缺陷的替补，同时也构成了缺陷本身。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弟弟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为人类带去了火种，但却也让人类意识到死亡这一永恒的缺陷。人类无法直面死亡，于是欲望成了“技术之外在化的内在对应物”，而这正是宙斯降下的对人类真正的惩罚——欲望的象征——美貌的潘多拉以及她手中充满未知的盒子被一道送往了人间，作为宙斯的礼物来到了爱比米修斯的家中。潘多拉打开盒子后，灾难、战争、疾病等各种苦难纷纷散落人间，唯独只有“elpis”被关在了盒子里。“elpis”在希腊语中一语双关，它既是希望，能够缓解人类对死亡的恐惧；“elpis”又是欲望，让人类备受其折磨。斯蒂格勒援引潘多拉神话发展而来的技术药理学正是要阐释技术双面性这一主导理路：如若说希望是技术的疗性，那么欲望便是技术所带来的毒性。

《沙丘 2》影片伊始，惨遭灭门之灾后幸存下来的保罗与母亲在绝境中获得了弗里曼人的庇护，保罗怀揣对未来的希望，决心加入弗里曼人，学习如何“开发沙漠的力量”。这既是保罗义无反顾走上的复仇之路，同时也是他抗争命运的方式——此时的他更愿意成为一名杰出的弗里曼战士，而非他人手中的棋子。但是，围绕在保罗身边的人，无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还是生存的压力，他们都渴望着保罗能挺身而出，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最典型的便是保罗的母亲杰西卡，作为姐妹会成员的她从保罗出生起就致力于将他培养成宗教救世主，成为弗里曼人的圣母后更是为了“李桑-阿尔盖布”的预言更加深入人心而四处奔走于气候恶劣的厄拉科斯。当杰西卡完成了在北方的布道任务准备启程前往南方时，保罗与她的冲突随之达到顶点。杰西卡坚信“我们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而保罗则是斥声反驳：“那不是希望！”此时的保罗或许早已看穿预言的毒性，但在欲望的裹挟下，最终依然避免不了走向既定的命运。除杰西卡以外，保罗的武术恩师哥尼、弗瑞曼人首领斯蒂尔格，他们对保罗的忠诚无可置疑，但同时也抱有各自的私欲和对未来的期许。而保罗或许同样有着自己的私心。尽管关于保罗内心转变的过程维伦纽瓦选择了一笔带过，但我们或许能从杰西卡的只言片语中窥见一二：“她（厄莉娅）说你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没错，保罗的转变正是发生在梦见深爱的契妮在战争中牺牲之后。

^① 陈晓明. “药”的文字游戏与解构的修辞学——论德里达的《柏拉图的药》[J]. 文艺理论研究, 2007(3): 58.

那么，被困在死亡里的人类，在得到预知未来的能力后，究竟是该成全宿命里的未来，还是选择反抗既定的宿命？这是导演维伦纽瓦借《沙丘2》抛给观众的斯蒂格勒之问。相较于原著，两名女性角色——杰西卡和契妮在电影中的改动是最大的。契妮一改小说中扁平的“贤内助”形象，是保罗身边唯一支持他秉持本性、抵抗权力的人。契妮和杰西卡是“elpis”的一体两面，象征着保罗内心斗争的两极：家族责任、权力诱惑 vs 不懈抗争、寻找自我。维伦纽瓦反复强调，他的改编真正想塑造的是一个反英雄、反神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契妮既是维伦纽瓦的解药，他通过改变契妮这一角色的人物弧光，升华了影版《沙丘》的主题表达；同时契妮也是保罗的解药，作为保罗最亲密的爱人，她的坚定是那把弑神的长剑。影片最后，契妮踏上了寻回自我的诗意旅程，似乎暗示着保罗终将隐没于沙漠的自我救赎式结局。

“对抗技术之药的毒副作用的唯一途径，就是依赖同一种药的解毒作用。”这种吸毒—解毒—吸毒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便是人类进化的过程。这份毒性早于药性是保罗服用生命之水时身体器官遭受的物理痛苦，迟于药性的则是保罗所经受的精神折磨。这种折磨在《沙丘2》中有过隐晦地呈现，那就是保罗服下生命之水后获知自己的母亲是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的女儿，自己的复仇对象竟然是自己的外公。可见，拥有一副广义器官未必见得是一件好事。对于保罗来说，从服下生命之水的那一刻起，他都将时刻生活在超忆症痛苦之中。事实上，从德里达解构的源头《斐德罗篇》开始，人类的记忆问题就与以书写文字为代表的技术深度绑定：“不过论到文字，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这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①

在这个故事中，药成了书写文字的隐喻，国王认为这剂药虽然能够帮助人们记忆，但这种外在于人的工具会给人类带来赖药性，人类真正的记忆能力反而被削弱了。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演进的历程本质上可视为记忆构建的过程，而记忆的形成又内在地蕴含了遗忘的维度。第一持留作为记忆活动，本身也是种“第一遗忘”，是把正在消逝之物简化为过去时刻，它所抓取的仅仅是第二持留所构成的准则允许它去遴选的东西。第二持留早就寄居于第一持留的全过程之中。保罗的预言能力正是第一持留、第二持留，以及外体化的第三持留的叠加，未来与伊勒琅公主的结合是他获得的记忆，而此刻的伴侣契妮以及过去的按照姐妹会的安排的伴侣菲德则是他无法延异到的记忆。

其实，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保罗在希望和欲望上的纠缠，记忆和失忆上的痛苦，整个沙丘

^① [古希腊]柏拉图. 斐德罗篇——论修辞术 [M]. 朱光潜, 译.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22: 149.

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超大型的药学环境。厄拉科斯原本是一个多水的星球，但是在沙鳃的出现吞噬了地球上大量的水分，厄拉科斯由此变成了一颗沙丘星，亲水的沙鳃也因为缺水变异成了恐水的沙虫。而香料正是由沙鳃的排泄物与水混合而成。沙虫和沙鳃、水和香料，以及亲水和恐水、食用和排泄这一系列一体两面共同造就了厄拉科斯别样的生态面貌，而弗里曼人世代传承的绿色行星梦想，也不过是在解毒与中毒来回摇摆的生态闭环中的南柯一梦罢了。

四、结语

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原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科幻叙事借助现代视听工业对于感知对象无可比拟的再造能力，不仅不显过时，还能为观众带来崭新的体验。“电影从文学手中接过了记忆，满足人们对故事的源源不断的需求。”但这并非电影的胜利，而是斯蒂格勒的胜利。在这个被他称之为“超工业时代”的当下，又何尝不是一个毒性与药性交织的非科幻化的沙丘世界呢？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极力推崇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巅峰。人类成了可以被计算的、数字化的存在者，人类理智的一切判断被外在化的技术器官所替代，“科技在家庭、教育、政治、司法、语言等各种社会系统中的极端迅猛与粗暴的渗透导致了普遍的无知化”。^①因此，斯蒂格勒说，这是理智的灾难。

然而，斯蒂格勒似乎也从未担心人类社会会因为超工业时代弥漫的毒性而崩溃。“永远不会有所谓完善的技术出现，就像永远不会有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出现一样。”无论是当下的人类世（Anthropocene）还是未来的沙丘世，它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让我们忍受毒性并将其转化为疗性的办法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像伊勒琅公主那样持续的书写：无论以何种方式书写，无论自己的书写是否正确，无论自己是否相信天外之音的传说。唯有主动地去拥抱和接纳技术，唯有对充满疗性的明天抱有期待，一个“负人类世（Neg-anthropocene）”的未来才会真正到来。

^① B.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103.